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着力点

——重温《邓小平文选》中关于基层民主建设的若干论述

□ 高冬梅

核心阅读

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次谈到基层民主建设，指出基层民主建设对于搞好党的建设、民众社会动员有重要意义，阐述了基层民主建设中如何实现党的引领和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文选》中关于基层民主建设的若干论述，对于当前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和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第五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能密切联系群众，“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为此，他严厉批评“尚简单避复杂”“不愿意走民主程序”的同志。他认为这样没有民主意识会从三个层面造成“麻痹党腐化党”的后果，“首先是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是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邓小平的这些思考都发人深省。

加强基层民主必须由党掌握“优势”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谈到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保持党的地位问题。他认为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抗日民主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如何掌握优势呢？“一是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即按照三三制规定的

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但更主要的是“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因此，他对基层政权中一些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的行为提出严肃批评。警告党内一部分抵制三三制政策的人，“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党的优势“表现在群众的拥护上”。

在中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基层治理（农业社会主要是乡村治理）基本是由乡村的士绅阶层来进行。近代以来，封建王朝的解体与军阀混战破坏了原有的治理模式。因此，梁漱溟等不少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乡村治理的新方案，但均以失败告终。唯有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设计和实践的基层民主治理模式，首先使破碎的乡村实现有效整合。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根据地“三三制”基层民主建设，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时期的基层民主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领导者、顶层设计者，而且是使民主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的研究者、推动者。邓小平上述对基层民主建设中如何实现党的引领的思考，是为例证。邓小平的这些思考不仅对当时基层民主建设有所裨益，他的“党的优势表现在群众的拥护上”的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角色在村民委员会制度、居民委员会制度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中如何实现，以及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如何体现党的地位方面也有重要启发。

加强基层民主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邓小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关于基层民主，他认为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他提出：在厂矿企业，“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也要有，“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在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搞民主办社；在学校，“也要扩大民主生活。教职员工会、学生会，要发挥作用，教职员、学生的意见要能充分表达”。“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他还认为这种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有三方面：一是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谨慎一些。针对一些企业领导对监督想不通的问题，他说：“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二是可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他多次表达了这一思想。1978年后，他说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成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三是有利于安定团

结的政治局面。他说，“群众把气出了”，群众的罢工罢课等“大民主”就不会出现了。党的十三大报告把他的这种认识表述为：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是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的基础。

其次，他还特别提出基层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对基层民主建设大有裨益。他指出：在农村当了一二十年的书记，“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当了两年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当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他还提出基层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也要区别对待，例如，“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这种制度应该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施行。他最后还明确了发展路径，“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

另外，他提出普选制度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他说，“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也就是说，要根据中国国情，普选先在基层落实，逐步推进。

邓小平关于基层民主的论述有很强的针对性，既有他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洞察，又有对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的筹谋。对于当前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典释义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讲话原文】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

【出处】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尝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

——（南宋）张栻《论语解·序》

【解读】

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其思想有比较突出的经世致用特点。《论语解》始撰于乾道三年（1167年）前后，成书于乾道九年（1173年，癸巳年），故又名《癸巳论语解》。该书通过解读《论语》，以明圣人之道。

知行观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二程（程颢、程颐）强调知行行易、知先行后。在《论语解》中，张栻在扬弃二程知行学说基础上，提出了“知行互发”的观点。他说：“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指出历代圣贤都主张知行兼重，因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意思是说，人们在开始时总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去行动，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然后用更深的认识去指导实践，从而把事情做得更好。张栻认为知与行紧密结合，二者互相启发，共同促进。人们正是在知与行之间的循环往复中，推动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发展。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张栻“知行互发”的观点，意在说明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杨立新）

讲述真实生动的改革开放故事

□ 韩庆祥

的有血有肉、有过程、有成长、有故事、有细节的改革开放“个人史”。不仅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个人的命运，而且因为这一个个体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才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红利的受益者。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且在不同程度上，书写着改革开放的历史，书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叙述应善于通过人和故事反映经济社会变迁、制度体制变革。改革开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场感”“体验感”，是其他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这种现场感、体验感对于理解、解释历史至关重要。

浙江文艺出版社以独特视角，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策划并组织出版的“我的四十年”丛书，着眼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人的命运的向好改变，选取“三种人”为主体，每一种选取四十人，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故事。

第一种，是我们国内的人民，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受益者。四十年来，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细节，经历了个人命运的变迁，全程体验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四十年四十人》。

第二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到世界各国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他们站在世界的坐标系和东西方

文化对比的场景中，与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同频共振，以独特的感知和体验，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影响。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四十年来家国》。

第三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各国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创业的外国人。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和视角亲历、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通过亲密接触和深度融入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亲历中国四十年》。

从茫茫人海中“随机”征集和“自觉”选定的这一百二十个人的故事，就是一百二十滴水，就是一百二十部史诗。汇集到一起，可以映见无数个人命运的发展改变，可以映见改革开放美丽故事的海洋，可以映见四十年来鼓舞的时代大潮和宏伟的壮丽史诗。这一百二十滴水也可以映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史不是一条平静的“内流河”，而是时刻与全球经济交融激荡的“世界性洋流”。这一百二十滴水还可以映见，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中国人、海外华人、外国人，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为了讲好这一百二十篇故事，三本书的主编以及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不辞一切劳苦，克服种种困难，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责任，加班加点，做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来稿的华人华侨生活在海外，有时差，编辑们都是在半夜三

更与作者联系沟通，修改文章；在国内的外国作者则来自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讲不同的语言，为了跟他们沟通好，把文章修改到位，请了许多翻译和朋友帮忙。为体现全面性、代表性并富有创新性，三本书稿文章的征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角色、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价、不同性别作者的典型性。经过艰辛努力，呈现给读者的，可谓是一套“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说好中国话语的丛书。

这套丛书最可贵的，就是立足于讲述“历史现场”中“人”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以鲜活真实生动的“个人史”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一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主题之书，是一部凝结个人发展命运的时代之书，更是一部有血有肉有温度的具备持久生命力的改革开放“史记”。讲政治、讲故事、讲全面，善思考、善总结、善提升，重感知、重本质、重形象，是本书最鲜明的特点。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也永远在路上！

（该文为“我的四十年”丛书总序，韩庆祥主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古代做官的一生都读书

□ 任万杰

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总之，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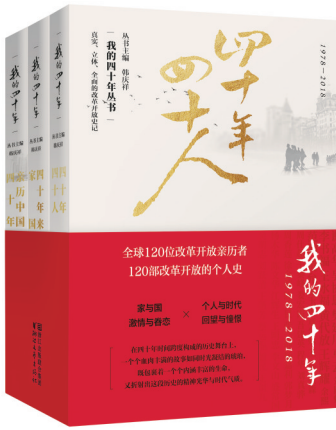
历代皇帝用人导向，以及偃

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设，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生备受器重。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汉代官员争相阅读《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上有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经》奉为必修课。

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中唐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城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

公元990年，宋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员遍赐《九经》，赵普、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几乎个个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宋太宗给赵普撰《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清心，硕学老儒，究有不及”。《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吏，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导向和榜样的力量，利益和爱好的结合，让古代身在官场的人，一生都放不下书。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是强国之路。1978年由中国共产党开启并领导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真正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惊世奇迹，全面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社会各界都在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全球意义、战略意义。不过，有的是从感性层面，有的是从知性层面，有的是从理性层面，很多研究成果已陆陆续续问世。

改革开放的主体是人。改革开放既要依靠人民，还要为了人民。在徐林总总的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成果中，除了宏大叙事的“改革开放全史”，也需要有微观层面的以“人”为主体和主线